

《人文论丛》
特辑

张之洞

与武汉早期现代化

陈锋 张笃勤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文论丛》特辑

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

陈锋 张笃勤／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 / 陈锋, 张笃勤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2
(人文论丛)

ISBN 7-5004-4196-7

I. 张… II. ①陈…②张… III. ①张之洞(1837~1909)—人物研究—文集②现代化
建设—研究—武汉市—近代—文集 IV. ①K827=52②K296.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6414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盛华印刷厂

装 订 海东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6.625

插 页 2

字 数 900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文论丛》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松山 瓦格纳 艾 兰 石 泉
史景迁 池田知久 刘纲纪 任继愈
朱 雷 谷川道雄 张正明 李学勤
杜维明 陆耀东 庞 朴 宗福邦
饶宗颐 章开沅 萧蓬父 谢和耐
裘锡圭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余光 龙泉明 冯天瑜 牟发松
李维武 陈广胜 陈 锋 陈文新
罗国祥 郭齐勇 陶梅生 戴老红

主 编:

冯天瑜

副主编:

郭齐勇 陈 锋 陈文新

执行主编:

陈 锋

执行编辑:

杨 华 杨逢彬 吴根友

目 录

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刘善璧 (1)
感受张之洞 研究张之洞	
——在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	章开沅 (3)
汉口的发展与张之洞督鄂	陈 锋 (5)
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化	何晓明 (16)
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与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	黄长义 (30)
张之洞的经世致用思想与晚清近代化	
——兼论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	苏中立 (40)
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兼谈张之洞在武汉洋务实践的特点	邵和平 (54)
张之洞与近代武汉经济的崛起	袁继成 吴明堂 (63)
张之洞在武汉的民间形象	皮明麻 (72)
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幕府	黎仁凯 (85)
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	吴剑杰 (94)
张之洞文案委员制在晚清官僚结构改革上的地位及其意义	尹圣柱 (106)
论张之洞的湖北模式	周秀鸾 (115)
张之洞调督湖广及建构“湖北新政”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陈 钧 (125)
张梁交谊与晚清湖北政局	严昌洪 (134)
论张之洞在湖北新政中的财政行为及其影响	江满情 (149)
清末湖北水患与张之洞的洋务新政	徐凯希 (162)
张之洞与芦汉铁路的建设	朱从兵 刘文俊 (171)
张之洞与粤汉铁路建设资金的募集	何智能 (190)
张之洞“湖北新政”遗产的历史命运	涂文学 宋晓丹 (199)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	
——张之洞与张謇比论	章开沅 (245)
关于张之洞历史定格的探讨	陈 辉 (248)
张之洞：晚清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	萧致治 (259)
张之洞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与晚清政局的演变	赵 可 (276)

张之洞与清末宪政	谢 放 (283)
张之洞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邱远猷 (294)
张之洞币制改革浅议	冀满红 赵晋胜 (308)
张之洞对商人群体的扶持维护	罗福惠 (322)
张之洞实业思想述评	潘洪钢 (334)
张之洞的“育婴”筹措述论	董丛林 (344)
清末封疆张之洞久不被忘原因初探	姚会元 (350)
张之洞“游学”、“广译”之倡对近代术语的促成	冯天瑜 (357)
略论张之洞对近代化追求的文化特色	刘学照 章征科 (372)
张之洞“中体西用”述评	董方奎 (383)
《劝学篇》与“中体西用”思想的传播	秦进才 (393)
《书目答问》所见张之洞学术文化思想略论	雷家宏 (402)
《张文襄公全集》奏折部分的几个问题 ——兼评《张之洞全集》的奏折部分	赵德馨 (411)
张之洞与广东治水	林家有 (420)
论张之洞与义和团运动中的“东南互保”	范小方 (430)
试论“东南互保”期间张之洞的对外交涉活动	冀满红 赵海亮 (438)
张之洞抚晋时期的政治取向	方秋梅 (447)
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笃勤 (458)
世纪回眸：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任 放 (472)
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论著索引	杜七红 (538)
后记	(581)

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 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武汉市政协主席 刘善璧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经过一年多筹备，今天开幕了，我谨代表本次会议主办单位，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向到会领导表示诚挚感谢。

本次会议研讨的对象张之洞，是一位晚清重臣，他一生跨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具有广泛影响。他先后任督抚 25 年，其中就有 18 年任湖广总督。在此期间，他除两次去南京暂时署理两江总督近两年外，其余 16 年都是在武昌度过的。他在武昌任职期间，修筑了长达 1200 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创办了包括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布纱丝麻四局在内的一批大型新式工业，建立了以新式学堂为载体的近代教育体制，编练了一支拥有新式装备和新式训练的湖北新军。这些洋务活动，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首领的地位，也使他成为湖北武汉地区现代化的先驱。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以爱国忠君为职志的清朝封建官僚，张之洞的洋务新政既未能阻止近代中国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沉沦，也没能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张之洞去世两年后，就在他长期苦心经营的武汉，爆发了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给评判张之洞的是非功过提供了多维的思考空间，也激发了人们研究这段历史的浓厚兴趣。近百年来，人们以不同角度和方式评价研究张之洞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特别是近 20 多年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现实和人们思想认识的解放，使张之洞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据统计，仅 1980 年至 1997 年，中国就出版研究张之洞的书籍 12 部，发表论文 203 篇。此外尚有关于张之洞的小说、电视剧等文学作品。如果加上中国台、港、澳地区，研究成果统计数量肯定还会增加。与此同时，国外的张之洞研究也有新进展。张之洞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仅研究面需要拓宽，已经研究过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所以自 1997 年在张之洞的故乡河北召开全国性“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后，学术界许多专家学者建议，在张之洞功成名就的武汉召开一次由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推动张之洞研究的深入发展。

为此，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政协武汉市文史学

习委员会，联合筹办了这次会议。会议的筹办得到了武汉有关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更得到海内外学术界专家学者的热情响应，有的专家因故不能与会，仍来信表达了对会议的赞许和祝贺，有的还寄来他们精心撰写的论文。此次会议还得到中央及地方学术期刊及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派代表前来采写会议的学术动态与新闻报道。这些都为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圆满成功提供了保障。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过去，但它却是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的。江泽民总书记在最近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把历史学明确列为必须加强研究的学科之一。其原因，除了历史学具有承传民族传统文化、提高国民文明素质的重要作用外，还可以从中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前人的智慧与经验。武汉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迈向现代化的欣欣向荣的特大城市，在前进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本次会议主题是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对张之洞在武汉的洋务活动的研究，总结其历史经验，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把武汉早日建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都会。

学术探讨中的不同观点及其论争，是学术研究活跃繁荣的表现，也是促进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在会议的发言讨论中，无论是年长的专家，还是年轻的学者，不论是国内同行，还是国外友人，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只要他态度严谨，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观点都应该受到尊重。希望与会的专家学者在学术讨论中，畅所欲言，各抒高见，使会议达到预期目的。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预祝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会议期间，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感受张之洞 研究张之洞

——在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
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华中师范大学 章开沅

各位代表：

恰逢初秋时节，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聚集武汉，共同探讨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堪称盛事。

中国近代史上的“二张”（张之洞与张謇）都是不能被忘却的人物。他们不仅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有筚路蓝缕之功，而且是学者型、思想型的近代实业家。

我从1961年着手研究近代民族资本家张謇，不知不觉已有40个年头了。其间，我曾多次到张謇的故乡——南通踏访历史的踪影，搜集有关的资料。南通是这位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状元资本家大展宏图的地方，他在这里办实业、兴教育，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经过张謇30年的苦心经营，南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以大生纱厂为龙头的一大批近代化企业，奠定了“南通模式”的基本格局。我每次去南通，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张謇的存在，强烈地感受到张謇精神的存在。张謇与南通之间，已经形成某种有着丰厚文化内涵的历史情结。南通人以张謇为自豪，并以张謇精神为动力，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

与张謇一样，张之洞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宦海沉浮几十年，在武汉的时间最长。那时，张之洞身为湖广总督，在武汉呆了整整18年。然后，离开武汉，入参军机，进入清廷最高决策圈，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在武汉，张之洞创办了具有近代工业特质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纱布丝麻四局，创办了从初等学堂到高等学堂的相当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创办了近代化的军队——湖北新军，创办了近代化的图书馆、报刊、编译、制图等文化事业，创办了近代商务局、商务公所及商品交易会，创办了近代交通业——芦汉铁路。由于张之洞的开创之功，所以武汉成为清末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大都市。百年沧桑，斯人已去，武汉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徜徉于当今武汉的街衢楼宇之间，人们却很难感受到张之洞的存在。

张之洞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对武汉对中国都有很大贡献。当然，在张之洞身上也有许多历史的局限性。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去研究，而且应该放到当今的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中来研究。

应该抓紧做好有关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这是进一步推动张之洞研究的前提。几年前，由河北省出版的《张之洞全集》虽然卷帙浩大，但有标点、排印等方面的错误。据我所知，湖北省史学工作者花费10年工夫整理的《张之洞全集》已经完稿，希望能够早日面世。

我建议：在武汉市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张之洞研究中心”。因为武汉曾是张之洞创制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的大舞台，而且武汉拥有许多的历史学者和近代史专家。此外，武汉恰逢难得的对外开放的机遇，整个城市有着强烈的现代化追求。

作为武汉市民，我们应该感受张之洞；作为武汉学者，我们应该研究张之洞。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职责。武汉市应该打张之洞这张牌，这是历史铸就的名牌，是武汉市独有的名牌。我们要学习张之洞开拓创新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恢宏洒脱的气魄，踏实稳健的作风。研究张之洞是为了超越张之洞。把历史与现实相互贯通，把张之洞与武汉现代化建设纳入我们的视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力求早日将武汉建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城市。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汉口的发展与张之洞督鄂

武汉大学 陈锋

明清以来，汉口商业繁剧，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汉口不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亦服膺全国四大名镇之名。“汉口”几成为武汉的代名词。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从而大为提升。概观汉口在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汉口开埠，它是传统商业市镇的兴起与鼎盛时期；二是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它是早期现代化的萌动时期；三是张之洞督鄂至清朝灭亡，它是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时期。

一 汉口商业巨镇的兴起与发展

明初的汉口一带，还是无人居住的芦苇荒滩。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形成，并由此入江。汉水故道淤塞，主河道移至龟山之北后，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之为“汉口”。嘉靖年间，汉口的人口增多，已有城镇居民区“坊”的出现，汉水口南岸有崇信坊，北岸则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汉口也在此时正式设镇，并设置有汉口巡检司对市镇进行管理^[1]。这标志着汉口镇的形成和初具规模^[2]。万历年间，湖广地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同时，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漕粮与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3]。

虽说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4]，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可能不对汉口的发展造成影响，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是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四聚”之说，也在这一时期盛行。《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5]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汉口在这一时期的繁盛程度，从“汉口镇火”的侧面记述中亦可见一斑：“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

家，不能扑灭。”^[6]毕沅督楚，时在乾隆末年，“汉口镇火”所描述的是乾嘉年间的情况。乾隆初年的情况则有如下描述：

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都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7]。

从这里的描述来看，是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都十分显著。所谓的汉口“六大行”也在这里被首次提出，而且“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各行业间的管理臻于完备，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六行最大”一词，“六行”之外，也还有其他的行业，“六大行”或后来的“八大行”之说，不过是概指。汉口的行业与商品种类繁多，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对乾隆时期汉口丰富的商品描述甚详，已有学者作过细致的引述，可以参见^[8]。章氏所记述的汉口的主要商品有食盐、粮食、竹木、纺织品、药材、山珍、海味、干鲜果品、糖、香料、茶、酒、毛皮、纸张、文具，以及铜、铁、锡、石膏等矿产品，煤、炭等燃料，还有烟草、鱼类、金银珠宝等类，有具体名称者达230多种。

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这首先得利于它的区位优势，时人有所谓“九省通衢”、“九省之会”、“七省要道”、“八达之衢”等代称或习称。在汉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注意到湖北的区位优势：“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郢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9]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以快速发展。即如方志所称：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谓九省之会也”^[10]。“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烦剧”^[11]。从此，湖北的大区位优势更彰显于汉口一地。此外，湖北及邻省的经济的发展，也促成并加快了汉口的商业繁荣。

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以粮食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12]。汉口成为米粮流转中心。以食盐而论，湖北、湖南向食淮盐，淮盐由仪征进入长江运至汉口，再由汉口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13]，汉口是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以《淮鹺备要》所载两淮行湖广引数777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计，每年由汉口转销的食盐大致在3亿斤左右，而回空盐船又载各色货物下行，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转运贸易体

系。应该说,粮食、食盐等的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没有疑问,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繁荣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的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这也就是康熙时的著名学者刘献廷所说的:“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14]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与国外也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是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

二 汉口开埠:早期现代化的契机

从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性城市着眼,1661年的汉口开埠^[15],是一个重要的界标。汉口开埠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外国各路商人也“立即趋之若鹜”^[16],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先后来汉通商^[17]。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汉口开办原料加工厂,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一八六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于一八六三年)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18]。据统计,至张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有如下数家:

- 同治元年(1862)俄商开办的顺丰砖茶厂
- 同治五年(1866)俄商开办的新泰砖茶厂
- 同治十一年(1872)英商开办的汉口砖茶厂
- 同治十三年(1874)俄商开办的阜昌砖茶厂
- 光绪元年(1875)英商开办的金银冶炼厂
- 光绪二年(1876)英商开办的汉口压革厂
- 光绪二年(1876)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
- 光绪六年(1880)英商开办的平和打包厂
- 光绪十三年(1887)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
- 光绪十三年(1887)德商开办的礼和蛋厂
- 光绪十五年(1889)德商开办的元亨蛋厂^[19]

这些原材料加工厂的开办,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俄商开办的顺丰、新泰、阜昌三大茶厂,其生产的砖茶销往俄国和蒙古,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共有资本银400万两,拥有15架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具有相当的规模。茶工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了茶贸易的增长,据统计,1874年汉口出口砖茶83402担,1877年增长为144756担,1878年增加到152339担^[20]。

汉口开埠后,“洋行”的出现也值得注意。1862年,被称为“洋行之王”的英商

怡和洋行（渣甸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最初主要经营轮船业，后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据《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怡和洋行内部设船头、银行、保险、进出口4部。其中，船头部下设轮船、趸船、码头、堆栈4个办事处，办理各有关航运业务。银行部开办“有利银行”，专门办理货物信托等业务。保险部经营各类水火保险业务。进出口部经营茶、棉花、棉纱、牛羊皮、五金机械等业务。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国也在汉口设立洋行。洋行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汉口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以怡和洋行的航运业而论，其拥有客货轮20多艘，行驶汉申、汉宜、申宜、宜渝等航线，在长江流域运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可以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

以下两表，正可以看出，从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这一段时间中，在国际贸易方面，汉口的贸易额及其在四大贸易商埠（上海、汉口、广州、天津）中的地位^[21]。

表1 1867—1889年汉口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

年份	全国进出口总额（两）	%	汉口进出口额（两）	占全国%	位次
1867	126696809	100	522342	0.41	4
1868	127066570	100	1398115	0.89	4
1869	128632943	100	1266253	0.83	4
1870	120917526	100	2290335	1.69	3
1871	133950789	100	3675409	2.36	3
1872	143510664	100	4075196	2.52	3
1873	138609437	100	4421536	2.86	3
1874	133954156	100	5258811	3.96	3
1875	138906756	100	5761239	4.15	3
1876	153241410	100	7271451	4.75	4
1877	143511725	100	4780725	3.33	3
1878	140360345	100	6469802	4.61	3
1879	157077750	100	7161360	4.52	3
1880	519523290	100	7672117	4.82	3
1881	165336609	100	5316356	3.22	3
1882	146841089	100	6387278	3.86	3
1883	145151331	100	7680670	4.56	3
1884	141477962	100	6016367	4.14	3

注：1867—1872年为（上海）银两，1873年后为海关两。

续表

年 份	全国进出口总额 (两)	%	汉口进出口额 (两)	占全国 %	位次
1885	154412594	100	7533095	5.32	3
1886	166517048	100	7127473	4.62	3
1887	190356344	100	3534121	2.13	4
1888	219227710	100	4143138	2.18	4
1889	210208738	100	5581695	2.55	4

从表 1 可见,在这一段时期内,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大多数年份位居第三,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但从占全国的比例来看,份额很小,浮动于 0.41%—5.32% 之间,既不能与上海相比(同期上海占 47.85%—63.63%),也与位居第二的广州有较大的差距(同期广州占 10.50%—13.39%)。这种直接对外贸易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地势使然。

汉口在这一时期的间接对外贸易,则如下表:

表 2 1865—1889 年汉口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

年 份	汉申津穗进出口总额 (两)	%	汉口进出口额 (两)	占总额 %	位次
1865	96062331	100	23245273	24.20	2
1866	109947343	100	30911218	28.11	2
1867	107546557	100	30537026	28.39	2
1868	118141066	100	30410181	25.79	2
1869	115599973	100	31049674	26.86	2
1870	113729983	100	33766249	29.69	2
1871	138583592	100	39524205	28.52	2
1872	133597566	100	36092343	27.02	2
1873	118022106	100	36339577	30.79	2
1874	111577189	100	33161563	29.72	2
1875	119669205	100	32955514	27.54	2
1876	137244179	100	33580934	24.47	2
1877	125793283	100	29396672	23.37	2
1878	122761948	100	29488544	24.02	2
1879	137836085	100	36194494	26.26	2
1880	148919738	100	42285209	28.39	2

注: 1865—1872 年为 (上海) 两, 1873 年后为海关两。

续表

年 份	汉申津穗进出口总额 (两)	%	汉口进出口额 (两)	占总额%	位次
1881	152952772	100	41599591	27.20	2
1882	135912918	100	34342894	25.27	2
1883	125717592	100	35354885	28.12	2
1884	124500863	100	33871881	27.21	2
1885	143557587	100	38247658	26.04	2
1886	150815700	100	34191477	22.67	3
1887	152037522	100	33888944	22.29	3
1888	163950365	100	35590882	21.71	3
1889	168677013	100	37610898	22.30	3

如上,在这一时期,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基本上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每年的间接进出口贸易额大致在 2300 万两至 4200 万两之间。从这里也可看出,汉口的对外贸易是以埠际转口的间接贸易为特色的。

上述可见,汉口开埠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开始启动,在对外贸易方面,尤其是间接对外贸易,走在了全国开放性城市的前列。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还只是初始性的,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及滞后现象。汉口开埠后,没有很快出现像上海开埠后那样令人瞩目的变化,开埠后的 20 多年间,近代工业格局迟迟不能形成。到 1889 年张之洞督鄂前,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天津、福州、南京等沿海沿江城市,甚至诸如西安、兰州、长沙、济南、昆明、太原等内地尚未开埠的城市,创办的军事企业达 20 个,武汉没有一个。同期,洋务派在各地所办的学堂达 20 所,武汉也没有一所^[22]。这正标示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在启动阶段的弱势以及发展的不平衡。

从历史的长时段考察,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武汉的城市转型始进入关键时期。

三 张之洞督鄂与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1889 年张之洞的督鄂,是武汉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界标。苏云峰所谓“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23],虽是就湖北而言,实则依武汉立论。

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 年),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

第一,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为例;张之

洞督鄂前的 1881—1890 年为 67362 担, 1891—1900 年即增长为 507630 担, 1901—1910 年更增长为 1073185 担,^[24]增长幅度明显。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25]从国际贸易商埠方面来看, 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 在张之洞督鄂前, 汉口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虽已位列第三, 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 到 1903 年已突破 1200 万两, 1905 年更突破 3500 万两; 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 张之洞督鄂前, 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 1880 年的 4200 万余两, 而 1899 年达到 6700 余万两, 1904 年已突破 1 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 都有了数倍的增长。以致有人声称: “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1905、1906), 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26]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 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 1892 年在汉的洋行数为 45 个, 人数为 374 人, 1901 年洋行数为 76 个, 人数为 990 人, 1905 年洋行数达到 114 个, 人数达到 2151 人。除洋行外, 还有许多外国商号。1905 年, 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 250 家, 其中日商居首, 有 74 家, 英商 57 家, 德商 54 家, 美商 22 家, 法商 20 家, 俄商 8 家, 丹商 5 家, 比商、印商各 3 家, 瑞商 2 家, 葡商、菲商各 1 家^[27]。

第二, 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 并得到迅速发展; 城市的经济功能, 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湖北枪炮厂(1890)、大冶铁矿(1890)、湖北织布局(1890)、汉阳铁厂机器厂(1892)、汉阳铁厂钢轨厂(1893)、湖北缫丝局(1894)、湖北纺纱局(1894)、湖北制麻局(1898)等近代企业, 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 24%, 为全国之冠^[28]。同时, 张之洞倡办实业, 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 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 年产火柴 1 亿盒, 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 至 1911 年, 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 28 家, 资本额达 1724 万元, 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 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 使武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 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 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做出较大调整, 各有侧重, 以“造真材, 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 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 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 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 1905 年, 仅留日学生就达 1700 余人, 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 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所奏: “近日中外教育家, 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 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 未有逾于此者。”^[29]

第四, 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 国内银行开始出现, 武汉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汉口开埠之前, 武汉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 1861 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 开外国银行在武汉开设分行之先河。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 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1863)、英国汇丰银行(1866)、英国有利银行(1866)、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英国丽如银行(1877)、英国阿加刺银行(1880)等在汉口